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人生大道 朱德傳

〔美〕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著
曹思宇 譯

Agnes Smedley

目錄

譯序.....	1
序章.....	9
第一部 道路的開端.....	001
第二部 通往革命之路.....	063
第三部 苦難深重.....	109
第四部 上下求索.....	151
第五部 大革命.....	179
第六部 土地革命開始.....	209
第七部 「現在請仔細地聽我歌唱」.....	261
第八部 赤色方陣.....	301
第九部 長征.....	327
第十部 與歷史會合.....	379
第十一部 「我們有一樣秘密法寶」.....	415
第十二部 「人生大道」.....	445
人名對照表.....	486
地名對照表.....	492
譯後記.....	497

譯序

從「盧溝橋事變」到珍珠港事件爆發，不少美國公民在此期間曾以個人身份向中國提供過援助。其中包括了頗具傳奇色彩的飛虎隊——這些美國志願飛行隊成員在日軍的圍追堵截之下，開闢了一條至關重要的空中生命補給線。許多傳教士也在慈善團體的支持下，除了採購並向中國人民輸送了大量糧食和醫療物資之外，還開設專門的電台廣播，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

美國記者們同樣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不僅被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所吸引，同時也對這片正在飽受蹂躪的土地產生了深深的同情。埃德加·斯諾就曾說過，「在西方世界找不出任何一部作品，能像自我克制和追求平衡感的中國文學那樣優雅和美麗。」他在 1936 年對毛澤東所做的採訪後來成為了解中國革命的經典之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風采與革命精神。又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曾六次來到中國，一生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中國度過的。她熱愛中國，堅持用正義之筆為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事業奔走呼號。在《人類的五分之一》(*One Fifth of Mankind: China Fights for Freedom*) 中，斯特朗寫道：「當中國人團結組織起來，把侵略者清除出去，並讓他們的土地

重獲自由時，他們取得的勝利的迴響，將在亞洲打破更多奴役的枷鎖」（1938:9）。

在這些關心和支援中國抗戰的美國公民中，《人生大道：朱德傳》（*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的作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無疑投入了最多的熱情。在熬過了飽受貧窮折磨的童年之後，史沫特萊投身於美國左翼社會運動，不久又對延安的革命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28年末來到中國後，這位不受教條約束的左翼記者始終不知疲倦地四處奔波，想要親眼看一看中國的革命和中國人民的生活。等到1937年7月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後，她的人生和中國的命運更是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在抗戰初期，她堅持留在中國，採訪並記錄戰爭的進程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情況。直到1941年春天，健康原因迫使她不得不選擇離開。後來在《中國駐地記者》（*China Correspondent*）中談及這段經歷對她產生的影響，史沫特萊表示「根本無法想像自己將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度過自己的餘生」，並且還不無苦澀地補充說，「我經常會忘記自己並非中國人這個事實」（1943:95, 349）。

在密蘇里北部出生的史沫特萊，父親是在全美國四處攬活的礦工，母親則是有錢人家的住家傭人兼廚子。她自幼生活在洛克菲勒的「採礦區」，用她自己的話說，科羅拉多燃料和鋼鐵公司在那裏擁有「除了空氣之外的一切」。或許是因為幼年時的耳濡目染，甚至連小學教育都沒有完成的她後來寫下了這樣的話：「我此生只忠誠於一件事，也只懷有一種信仰，那就是致力於窮苦人民和受壓迫者的解放。正因為如此，眼前所見的中國革命便是我現在的信仰」（*Battle Hymn of China*, 1943）。要用短短幾句話來還原史沫特萊傳奇的一生，無疑是十分困難的。但通過她生平的部分經歷，或許能讓我們稍稍了解這位畢生追求社會公正的工人階級鬥士為何會堅定地做出上述宣言。

輟學後的幾年裏，史沫特萊先後做過捲煙工、速記員和女招待，然後在二十多歲的時候離開西南部前往紐約。她在紐約為印度民族主

義團體工作過，還被指控是「德國間諜」，並於 1918 年遭到逮捕和單獨監禁。這段經歷進一步加深了史沫特萊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憎恨。等到 1919 年末指控最終被撤銷後，史沫特萊登上了駛往歐洲的輪船。她在柏林尋找那份讓她身陷囹圄的印度流亡者創辦的報紙，並遇到了革命領袖維倫德納拉特·查托帕迪亞（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在與他共同生活的八年中，史沫特萊接觸並研究了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在柏林，她在瑪格麗特·桑格的資助下，和一群懷着進步思想的醫生共同建立了第一家國立計劃生育診所。德意志共和國政府隨後接管了這家診所，並仿照其模式，開設了另外幾家類似的機構。可納粹上台後，婦女「被勒令回到臥室去」，計劃生育診所成了極右派的眼中釘。面對希特拉的威脅，維倫德納拉特離開德國前往列寧格勒科學院，而史沫特萊則於 1928 年在《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得到了一份派駐中國的特約通訊記者的工作。

從蘇聯和中國接壤的東北（即當時的「滿洲」地區）進入中國時，史沫特萊感覺自己彷彿回到了中世紀。她當即下了決心：「我之後的生活不能遠離中國人民，要想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國家，唯有融入他們。不然我在這裏所做的一切，都將失去意義。」在東北，史沫特萊很快意識到日本在鐵路、政府機構、工廠和土地投資等領域所擁有的經濟控制力與政治權力。她為此撰寫了一系列記錄日本在東北活動的文章，可直到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這些文章才得以刊發並為世人所知（詳見 Jan MacKinnon & Steve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A Working Introduc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5 Jul., 2019）。

當時的外國媒體和中國本土媒體一樣，要麼被金錢收買了，要麼被迫保持沉默。史沫特萊了解到，代表英國官方的路透社和國民黨政府達成了秘密協議，核心內容是確保該新聞社每月可以獲得一萬美元的傭金，而作為交換，路透社必須發表對國民政府有利的宣傳報道。美國的新聞機構也和國民黨有類似的協議，這在當年早就是人盡皆知

的「秘密」。從 1929 年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到抗日戰爭期間，外國媒體不斷地為國民黨政府所取得的「成果」高唱讚歌。可與此同時，史沫特萊卻在報道中國進步人士（甚至包括了那些同情左翼進步力量的國民黨黨員）遭到監禁的情況，他們中的很多人僅僅因為是工會成員或左翼知識分子，就被公開處決。由於史沫特萊堅持獨立公正地報道，英國秘密情報組織聲稱她是英國公民，嫁給了印度分裂主義分子，並且涉嫌使用了「偽造」的護照。直到經過多方努力，「後知後覺」的美國領事館才想起自己還有保護本國公民免受英國特勤機構騷擾的義務。

史沫特萊將上海作為自己的辦事處，揭露了與日本在東北公然沆瀣一氣的國民黨官員的腐敗和叛國行為。她還意識到，在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國民黨員不過三萬九千人。因此換句話說，它已經淪為了「一家由政府官員及其下屬組成的小型封閉公司」。工會的會費成了給國民黨的「進貢」，用來鎮壓抗議活動。至於本應急需推行的土地改革，更是無從談起。

1930 年，史沫特萊見到了魯迅，用她的話來說，「我在中國度過的那些年裏，他是對我影響最深的人之一」。在送給魯迅的德文版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的扉頁上，史沫特萊寫道：「贈給魯迅先生，對他為了一個新的社會而生活和工作獻上敬意。」此後，他們聯合宋慶齡女士，於 1932 年創立了第一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敦促國民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要求停止對政治犯的拷打和屠殺。

但就在同一年，受到納粹掌權的影響，《法蘭克福日報》解雇了史沫特萊。失去了工作和收入，她的健康狀況也開始惡化。1933 年，她前往蘇聯休養了十一個月，並在那裏完成了《中國紅軍在前進》（*China's Red Army Marches*，又名《中國紅色風暴》）一書的撰寫工作。不過她心繫中國的時局，因此計劃從美國出發返回中國。在美國短暫停留期間，她詢問了許多報社，希望成為派駐中國的特約通訊記者。結果沒有任何一家美國報紙敢雇傭她。如此境遇並沒有出乎史沫特萊

的意料，反而加深了她儘快離開美國的決心。

1936 年春，她回到了上海。由於身體情況欠佳，友人建議她前往西安療養，結果反而幸運地獲得了西安事變的第一手報道資料。不久之後，史沫特萊動身前往延安的紅軍司令部，並在那裏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與紅軍總司令朱德見面後，史沫特萊決定為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將軍寫一部傳記。然而，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立即對中國發起了全面入侵，這讓她不得不中斷了原先的寫作計劃。

但戰事並沒有令史沫特萊退縮。她加入了紅軍，並於 1937 年 9 月前往正在激烈交戰的綏遠和察哈爾。儘管必須時刻忍受背部舊疾的折磨，她還是堅持在前線報道傷員的情況以及日益嚴重的饑荒和疫病，並積極呼籲各界提供醫療援助，建立流動診所，招納公衛服務人員。就連史沫特萊本人也很快成了「在戰線上奔波的急救員」，經常在連自己都站不穩的情況下，替擔架上的士兵們做緊急治療。在跟隨紅軍四處行軍作戰期間，史沫特萊親眼目睹了將士們抗戰到底的勇氣，堅信紅軍的革命精神必將領導和拯救中國，並為亞洲所有被奴役民族的解放事業注入一針強心劑。在抗戰前線，史沫特萊完成了新書《中國在反擊》(*China Fights Back*)，並始終沒有停止朱德傳記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一直到 1938 年她接到任務前往漢口組織紅十字會募捐，才不得不和朱德將軍分別。

在完成了漢口的任務之後，史沫特萊返回美國。由於當時國民黨和美國政府關係甚密，她的「親共」言行招來了嚴厲的打壓。面對各種莫須有的誣衊，史沫特萊沒有屈服，始終拒絕按照當局的要求來撰寫醜化中國共產黨的文章，拒絕因為壓力而辜負在陝北時期便結下的革命友誼。可隨着時局的不斷惡化，史沫特萊健康狀況變得十分糟糕，還不幸罹患了胃癌。儘管來往通信一直遭到嚴格的監視，她還是通過董必武給朱德將軍寫信。朱德在得知她的情況後感到無比痛心，想方設法給她寄去了不少信件和中國的紀念品，希望以此給她帶去心靈上的慰藉。

史沫特萊一直想回中國，卻屢屢受挫，無法成行。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史沫特萊孤身一人在美利堅，慶賀當年的戰友們實現了自己願望，遙祝中國人民可以過上美好的生活。1950年4月28日，為了能回到中國，史沫特萊選擇進行大面積的胃部切除手術。她深知其中風險，於是在手術前立下遺囑，要將多年來的全部積蓄交給朱德將軍，並希望死後能葬在中國，希望中國的戰友們能在墓前為自己唱響新中國的國歌。

奇跡最終沒有出現。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因為手術失敗，不幸離世。當律師將她生前留下的巨額稿費和去世的消息交到朱德手中時，朱將軍感到十分悲痛，因為紅軍失去了一位最親密的國際戰友和同志。1951年，史沫特萊的骨灰經歷諸多坎坷，終於送到了中國，並交給朱德將軍接管。後經黨中央高層一致決定，為肯定史沫特萊長期為紅軍所做出的貢獻，將史沫特萊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下葬儀式時，朱德和在場的所有人為這位國際戰友唱響了《義勇軍進行曲》。

《人生大道：朱德傳》是史沫特萊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本書從朱德在儀隴縣附近的小村莊出生寫起，堅持以朱德將軍的敘述視角出發，穿插結合了不少作者本人搜集查證的史料和調查報告，詳細而又生動地記錄了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數次圍剿與反圍剿、抗日戰爭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戰勝利等一系列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最值得銘記的大事件。與此同時，史沫特萊還牢牢抓住朱德這位革命領袖的個人命運這條線索，將國家民族命運和個人的彷徨求索緊密結合在一起，讓人不禁感歎中國近代歷史上，無數有識之士是如何前赴後繼地犧牲自我，為「救國圖強，民族解放」這一崇高信念而投身於革命。運用自己力求公正同時又飽含真情的筆觸，史沫特萊向全世界讀者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理解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窗口。朱德將軍的講述是真摯與坦誠的，史沫特萊也將這份質樸和堅毅的革命精神原汁原味地記錄了下來。

來，為艱苦卓絕的革命敘事增添了有血有肉的真實感。這是這部傳記的獨到之處，也是讓廣大熟知中國近代革命史和抗戰史的專業學者在閱讀此傳時，仍能感到心潮澎湃和豁然開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傳記前言中，史沫特萊在開頭就提醒讀者，雖然自己得到了朱德將軍的授權來撰寫此書，但這並非是「一部正式的官方傳記」。由於後期長時間無法回到中國，很多資料缺失且難以查證，因此涉及很多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的史實（包括人物姓名、軍隊番號、具體年代等），存在表述不夠精確甚至是「張冠李戴」的情況。然而，瑕不掩瑜。從初到延安時起心動念要寫這樣一部傳記，到後來在美國時期忍受病痛折磨反覆核對資料並完成整本書的撰寫工作，史沫特萊筆下的這部《朱德傳》早就不僅僅是一部關於革命領袖的個人傳記，而是關於偉大的中國革命和了不起的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全景式的史詩。在翻譯本書時，譯者結合公開史料和近年來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原作風貌的前提下，以校註形式做了一些必要的勘誤。與此同時，史沫特萊文字中激昂着的革命熱情與對中國人民的友誼也讓譯者甚為感佩，並十分有幸，能在翻譯這部《朱德傳》的過程中，重溫老一輩革命者那份純粹的「赤子之心」和敢與一切反動勢力鬥爭到底的無畏精神。

這或許不是一部「學術味」十足、動輒引經據典的革命史作品，但卻是一段關於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人所走過的偉大旅程的真摯記錄。在《人生大道：朱德傳》中，朱德將軍反覆提及小時候自己家門口有一條「大道」。這條道路的一頭連着他懵懂的童年，一頭連着自己外出求學，繼而走上革命征程的後半生。書中同樣寫道，「大道」上每天都有來來往往的旅人，他們來自天南地北，為了平凡的生活而奔波。可是當民族面臨存亡的威脅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和朱德一樣，踏着這條路，成了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的一分子。在作品的最後一章，史沫特萊提及內戰的陰雲正在中國的上空積聚，中國共產黨人和無數為國家的前途而奮鬥的人們顯然沒有停下腳

步，仍然在這條革命的「大道」上砥礪前行。或許在史沫特萊看來，朱德記憶中的那條「大道」實際上已經延展成為了一種精神的象徵：路的一頭連接着這個民族無比坎坷的近代史，一頭則指向了充滿希望的未來。

時光荏苒，風雲變幻，「大道」上的同路人們，還要繼續前行。

2023.11

曹思宇

序章

本書講述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在六十歲之前的生平。我雖然得到了朱將軍的授權來撰寫此書，但這並非是一部正式的傳記。受限於時差以及遠隔重洋的不便，再加上作為撼動世界的中國革命事業的主要領導者之一，朱德始終肩負着重任，這使他無法對我記錄的事實和所做的解讀進行最後核實。

最初起心動念撰寫本傳是在 1937 年 1 月，那時我剛剛抵達位於中國西北的古城延安。當時的中國工農紅軍，以及決定這支部隊未來命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剛剛進駐延安並在這裏建立了指揮中心。在此之前，我在中國生活的整整七年時間裏，中國政府的官方報紙，以及在海內外隨聲附和的外國媒體，給朱德將軍冠上了諸如「赤匪頭子」、「共匪」、殺人犯、盜賊、縱火狂等各式各樣的蔑稱。但他們從未解釋過，為何千千萬萬可敬而又勤勞的農民和工人，以及滿懷理想的學生和知識分子，會為了他所信奉的事業，心甘情願地去奮鬥，去獻身。

他的名字充滿了傳奇色彩。所以剛到延安的時候，我料想自己即將見到的是一位英勇無畏而又性格火爆的人物，是一位具有鋼鐵般意志的革命者，他口若懸河，能讓聽者心潮澎湃。帶着這份強烈的好奇

心，抵達延安的頭天晚上，我便和兩位友人一起前往他的司令部，還有幸踏進了他的屋子。

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沒有上漆的桌子。在燭光的映照下，桌上堆着書籍、文件、稿紙。還有一個穿着藍灰色棉制服的模糊人影，一見我們進了屋，便站起身來。

起初我們就站在那裏，互相打量着對方。我早知道他當時五十一歲了，但此時此刻，我發現他的面龐佈滿了深深的皺紋，兩頰下陷，比實際年齡看上去至少年長了十歲。他最近才剛剛完成了史詩般的紅軍長征，營養不良和痛苦磨難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記。

他身高大概有五尺八英寸。相貌不算醜陋，但也稱不上英俊，渾身上下看不出一丁點兒英勇無雙或是脾氣暴躁的跡象。渾圓的腦袋上，稀疏的黑色短髮間夾雜着些許銀絲。他的額頭又寬又高，顴骨凸起。一對堅毅有力的上下顎支撐起一張大嘴。他笑着歡迎我們到來的時候，露出來一口潔白的牙齒。他的鼻子又寬又短，皮膚黝黑。他的外表看上去實在是其貌不揚，如果不是因為穿着軍裝，他很可能被當作是中國哪個村子裏的普通農民。

人們早就告訴過我，說他單純善良、平易近人，做事勤懇努力，對於讓自己成為甚麼英雄豪傑，根本毫無興趣。看起來，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但要說他「單純」，似乎實在有些勉強。他的雙眼緊緊盯着我，目光機敏而又銳利。和大多數中國人的黑眼睛不同，他的眼睛很深，一雙大大的褐色眸子透出伶俐和機敏的感覺。我知道，一個像他這樣有着長期艱苦經歷的革命領袖，絕沒有在保持十分單純的情況下生存下來的可能。

有一樣東西是我立刻就感受到的：他渾身上下都散發出一股男子漢氣概，包括他的聲音，他的一舉一動，乃至他略顯笨拙的站姿。待我的眼睛逐漸適應了屋內昏暗的光線後，我發現他的制服因為長時間穿着和反覆洗滌，早已變得破舊褪色。而且我還注意到，他並非面無表情，而是讓內心閃過的所有情緒都明明白白地寫在臉上。

我此時腦海裏還在回想關於他的許多故事，便和他說起人們管他叫「土匪」的事。我本以為他會和我一樣一笑置之。可他並沒有，而是突然陷入沉默，垂下了頭，盯着腳下的泥土地。他的臉色變得蒼白，似乎悲從中來。就在那個瞬間，我捕捉到了某種深邃而又悲傷的情緒。他的朋友和同志們想來也極少目睹這種情況，因此在他們的口中，他素來都是一個樂天派。片刻之後，他抬起了頭，用雙眼平視着我並說道：「土匪問題其實是個階級問題。」

我想起了美國西部民謠中的一句歌詞：「有的人用槍來搶劫，而有的人搶劫用的是鋼筆。」但我沒有說出口，而是立即將話題引到了他的生平經歷。他對於我提出的其中一個問題做了澄清：他的出身並非富裕的地主，而是四川省一個窮苦佃農家庭的兒子。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同志們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一個人）知曉他的生平。更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時間坐下來，為他或是其他人的生平事跡作傳。

就在他說話的時候，我萌生了為他寫一部傳記的想法。所以當他問我打算在延安做些甚麼事的時候，我回答說：「希望您能把自己生平的點點滴滴講給我聽。」

「這是為甚麼呢？」他問道，言語中充滿了好奇。我回答說：

「因為您是一位農民。每十個中國人裏就有八個是農民。而迄今為止，他們中還沒有一個人向世界訴說過自己的故事。如果您將自己的一生經歷告訴我，那將是中國農民第一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我的一生不過是中國農民和士兵的生活的一小部分，」他如此說道。「再等一等，四處看一看，見一見其他人，再做決定不遲。」

照着他的建議，我確實見到了許多比朱將軍更加具有戲劇色彩的人物，他們的人生經歷可說是創作偉大文學作品的絕佳素材。但中國農民絕不是一個戲劇化的群體。我依然堅持自己最初的想法，於是在1937年3月，我們開始了工作。

每星期都有兩三個晚上，由我把朱將軍告訴我的故事記錄下來。日積月累，時光如流。我有時不免對自己的工作喪失了信心。他來自

一個出身卑微又目不識丁的家庭，沒有任何信件、書籍、文件或是日記可供參考。他不可能每次都記得事情發生的確切日期，而在他四十歲之前，社會上幾乎沒有任何關於他的記錄。他一生勞碌，而且似乎時常覺得童年的種種細節無足輕重。中國式的家庭生活、他的軍旅生涯，以及他作為共產黨員的紀律和生活，將他塑造成為了一個集體主義者。因此，有時候很難弄清楚他作為個體의思想和行為，也難以判斷他產生蛻變、投身革命的起點。

關於他的生平事跡只講了一半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他便動身去了前線。我於是將這份傳記材料擱在了一邊。但沒過多久，我也出發去了前線，不僅僅是為了另一本書的寫作，同時也是為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能夠在實際行動中對他進行觀察。於是，整整一年的時間裏，我得以觀察到他在工作、放鬆，以及和日本帝國主義交戰時的表現。

拋開他負擔的那些多不勝數的軍事和政治任務不談，我似乎從沒有見過哪個人對生活昂揚着這般執着的渴望，也沒有見過哪個人是如此堅定地踐行民主。人生的方方面面，他都渴望去探索，去理解。在延安，除了每週照例與我一起工作的夜晚，他有時會來串個門，與我和其他人交談。這些人在我駐地灑滿陽光的院子裏飲茶、吃花生、講故事、拉歌，或是照他有時候的說法，一起「吹吹牛皮」。

在這樣閒適友好的時光裏，我常把所有人都排成隊列，教他們弗吉尼亞土風舞。這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朱將軍跳土風舞。伴隨着do-si-do的音符節拍，他會讓舞伴盡情旋轉搖擺，腳下塵土飛揚，陣勢之大不亞於隊伍裏最年輕的衛兵。待我把自己關於土風舞的一切知識都教給他之後，他又求我教他西方的交誼舞。我也欣然相授。

他跳舞和工作的時候一樣——鏗而不捨，且極富耐心，堅信這也是顛覆舊中國封建習俗的另一種方式。他雖然很喜歡跳舞，但是和興趣廣泛的賀龍將軍不同，朱將軍並沒有成為傑出舞者的天賦。

由於一直在身邊觀察朱將軍，我有時會看到他在紅軍大學——後

改名「抗大」（即「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課，或和學員們一起在學校的庭院裏打籃球。後來在前線時，我還經常坐在邊線充當裁判，看他和自己的參謀人員組隊，和司令部的一些衛兵們打籃球比賽。朱將軍還時常略帶感傷地搖着頭，感歎自己球技平平，以至於年輕的衛兵們從來都不喜歡和他當隊友。

他既喜歡戲劇，也喜歡唱歌。無論是在延安或是在前線，唯有必須處理的工作才能讓他放棄觀看戲劇演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年裏，來到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團曾公開放映了一些美國電影，他幾乎每場必到，還不時被影片裏的「高腳七」和「矮冬瓜」^①逗得大呼大喊。聽說這兩個角色的表演很像是中國傳統的相聲和滑稽戲。

他和我準備一塊兒工作的第一個晚上，我和張麗麗^②站在一起。麗麗是一位年輕的演員，也是我的中文老師、秘書兼翻譯。我們就在自己所住的黃土窯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遇到我聽不懂中文，或是用朱將軍和我知道的那些德語也沒法溝通的時候——這種情況倒是常常發生——便由麗麗充當我們的翻譯。我們一邊等他，一邊俯瞰着面前山谷包圍着的小城延安。延水從古老的城牆內緩緩流淌而出。河對岸的黃土崖上聳立着一座高高的佛塔。視野繼續延伸，山谷內是一片開闊的平川壩子，延水經此向東，匯入被稱作「中國的憂患」的黃河。那片平川壩子現在是操練場，不久之後會變成飛機起落地。就在最近，它還一度被當成賽馬場。當時有一批騎術高超、身強體壯的蒙古族人，從北方騎馬來而與紅軍舉行會議。為了這件事，朱將軍帶着警告的意味，向所有的婦女和女孩發出建議，要她們少露面。就算迎客

① 這裏的「高腳七」和「矮冬瓜」指的是「阿波德」（Abbott）和「考斯提洛」（Costello），是美國導演查爾斯·拉蒙特（Charles Lamont, 1895–1993）執導的滑稽電影中的人物。（本書所有註釋，如無另行標識，皆為譯者註。）

② 這裏所說的應是史沫特萊的秘書兼翻譯吳光偉（本名吳廣惠，又名吳麗麗，也寫作「吳莉莉」）。1934年與張碩田成婚，因此史沫特萊改稱她為張麗麗，可能是承襲西方習俗，在女方婚後改稱夫姓。

的時候，也要裝扮得端莊一些，免得客人們誤解了我方對他們的歡迎之意。

然而，包括我在內的婦女和女孩們，都湧到了那片寬闊的平川壩子上觀看蒙古族人和紅軍騎兵之間的賽馬。蒙古族騎手們乘馬疾馳，同時騎手自己則在馬鞍上向後仰去，最後幾乎完全躺在了馬背上，此情此景，真叫我們感到驚佩。一位紅軍騎手向我借了那匹速度敏捷的小馬用來比賽——那是朱將軍送給我的。看着那匹像阿拉伯駿馬一樣的小馬逐漸落在那鬃毛飛揚、長尾飄飄、健壯得像坦克的蒙古小馬的後面，麗麗和我都喊得聲嘶力竭了。蒙族人現在已經帶着紅軍的軍事和政治顧問們一起回到了內蒙古。抗日戰爭正在準備之中，革命的怒濤也已襲向內蒙古了。

朱將軍是一個十分守時的人。約定的時間一到，我們看到他穿過下方山谷中的小城街道。他的警衛員跟在他質樸的身影後面。朱將軍時不時轉過頭去，大概在說着些甚麼。他走路時上身稍稍前傾，雙腿好像踏步一樣向前移動。他就是用這種步態，走過了中國數不清的小徑和大道。他登上黃土崖的時候，嘴裏咳個不停。他在西康終年積雪的山區感染了沙啞性支氣管炎。他一度停下腳步，和那個腰間別着自動手槍的年輕警衛員一起站在那裏，仰望着延水流經的山谷，一邊指向遠處，一邊互相交談着。城鎮上的人們都在談論，要在河谷上建一座水壩，用來攔阻洪水，提供灌溉，還要在裸露的山丘和山谷上重新造林。他們的說話聲傳到我們這裏，他的聲音比較低沉，還帶着些沙啞，與他身邊那位高大英俊的年輕人那高亢清新的嗓音混在一起。我突然想到，在這場浩浩蕩蕩的中國革命中，有三代人參與其中：朱將軍這一代，青年警衛員這一代，還有更加年輕的十幾歲的年輕人這一代。

朱將軍和年輕警衛員上山來到了我們所在的平台上。與我們住在同一層的那戶農民家聽到他的聲音，立刻走了出來歡迎他。這是農民和農民之間的熱情招呼；他走到那家人中間，拍了拍一個小男孩的

腦袋，又從那家母親的懷裏抱過嬰兒，高高舉過頭頂，和孩子一起歡笑着。

正是在這樣的氣氛和這樣的環境中，本書正式拉開了序幕。

第一部

道路的開端

第一章

我倆隔着一張小桌子面對面坐着，燭光就照在他佈滿皺紋的臉上。朱將軍的雙眸閃爍着光芒，似乎是被好奇心驅使着，想聽聽我會對他的生平提出甚麼樣的問題。

我提議道：「就從頭講起吧。」

於是，他開始了講述。他出生在四川省儀隴縣附近，農曆生日相當於新曆 1886 年 12 月 12 日，就在太平天國運動遭到清廷及其外國同盟鎮壓僅僅過去 22 年之後。他給出的出生日期是用舊農曆計算的，中國共產黨的報紙後來說那是 11 月 30 日，而當時另一位開始為他撰寫傳記（不過後來半途而廢了）的中國作家又推算說是 12 月 18 日。或許朱將軍自己也不清楚確切的出生日期；但他是出生了，這一點確是毫無疑問的。^①

他說，雖然自己在兒時有一個正式的大名，但一生下來就被喚作「狗娃子」，因為按習俗會給男嬰取一個帶動物意思的乳名，用來瞞過那些專門候着想把男孩兒捉走的妖怪。女孩兒則被認為是無足輕重

① 根據目前可查證的公開資料，一般將朱德的出生日期認定為 1886 年 12 月 1 日（農曆十一月初六）。

的，甚至連妖怪都懶得騷擾她們。

「這一輩子，您最早有記憶的事情是甚麼呢？」我問道。朱將軍回答說，「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兒。」

「那就和我說說這些無關緊要的事吧，」我勸說道。

他低下頭，坐在那裏沉默了一會兒，眼睛盯着自己緊握的雙手。然後他支支吾吾地開始談起光線、顏色、聲音、高山和森林、「和我張開的手掌一樣大」的芬芳野花、「香氣四溢，數里不絕」的花朵。他還說起和煦的陽光、流淌的河水和一首短小的搖籃曲。

他母親會唱這首搖籃曲。而且為了逗他開心，她一邊唱還一邊擠弄着眉毛做各種表情：

月兒像眉毛，
月兒彎彎兩頭翹。
月兒像眉毛，
月兒像鐮刀。
不似皺眉，常開顏噉。

這首搖籃曲在他的內心同時勾起了快樂和苦楚——感到快樂，因為那是母親唱給他聽的曲子。然後又覺得難過，因為她對他的弟弟也唱了這首曲子。他原本以為，這首曲子是專屬於他一個人的。

他想起自己在襁褓時期和童年裏都幾乎感受不到關愛。他是「野」大的，除了吃、穿和住之外，他不得不一切都靠自己解決。他知道母親是愛他的，記憶中她從未對他說過一句重話。她是那麼勤勞苦幹的一個人，以至於能擠出空間來照顧的，唯有還在她懷裏吃奶的那個嬰兒。母親的懷裏，永遠都抱着一個正在吃奶的嬰兒。

「我愛我的母親，但我懼怕並且憎恨我的父親，」朱德平靜而自然地說道。「我永遠無法理解，為何我的父親會如此殘忍。」

剛一學會拿勺子，他就自己吃飯了。後來又用起了粗糙的筷子。

難過的時候，他要麼獨自哭泣，要麼壓根不哭，因為沒有人有空來安慰他。天氣暖和的時候，他就光着身子到處亂跑。但等到了冬天，他就穿着單薄的棉服和棉褲。褲子後頭還是開檔的，以便他在需要時可以自己蹲着方便。他有沒有生過病？沒有，他這輩子從來沒生過病。

帶着奇妙的心情，他回憶起自己兒時嬉戲玩鬧的場景。「玩得昏天黑地，累得隨便找個地方都能倒頭睡去。睡醒起來之後又接着瘋，然後玩累了再次倒在地上，又睡了過去。」

他微微一笑，回想起一縷縷穿過樹蔭的斑駁陽光。他試圖用髒髒的小手去捉住陽光時，卻捉了個空。在離他家挺遠的地方有一些果樹。每逢盛放時節，他會去搖晃樹枝，讓花瓣飄落在身體周圍，好似花雨一樣。野花遍地，房子後頭則是一片沙沙作響的竹林。一棵遮陽樹的高枝上懸掛着長長的鞦韆，一段圓木上橫架着蹺蹺板。附近不遠處有一條河，狹窄而湍急。對岸的山腳浸潤其中，又向上聳立於河面。河岸上四處可見紅色的鵝卵石，河上還有一座橋，數艘小船和幾隻竹筏。魚兒則在波光粼粼的河水中不住地撲騰。

他家屋子的西邊是一座狹長的矮丘，喚作「眠犬山」。而矮丘再往外走，就是所謂的「大道」，路很寬，足夠大板車通行——這是一條挺險的路，一直通向霧氣朦朧的遠處，從南邊延伸上來，然後消失在北邊的群山之中。

朱將軍說話的同時，我的腦海裏浮現了這樣一幅畫面：一個胖嘟嘟的小孩兒，頭髮剃得精光，夏天肚子上只繫着一條小肚兜，或是小圍裙——一個快樂而堅韌的小傢伙，就像一艘結實的小船，在暴風雨肆虐的驚濤駭浪中啟航前行。

他幼時最早的記憶之一，就是體會到了世間的不公。他和自己的兄弟們喜歡在河水或者池塘裏釣魚。但他們只能偷偷地幹，以免被地主的管家逮到——因為河裏所有的魚，甚至他們自家小農地的池塘裏的魚，都是屬於地主丁老爺的。丁家老爺會派人用網子把魚兒撈得乾乾淨淨，然後全部帶走。狗娃子和兄弟們尖叫着抗議，但家裏的長輩

們卻只是一言不發地在旁看着。等那些人走了，他的父親才會忍不住咒罵幾句。到了秋天，這批人又會被派來摘光果樹上的果子。有的時候，他們還會罵朱家是盜水果的小偷。河水和池塘裏所有的魚，佃戶土地裏所有的水果，山上所有的樹林，丁老爺都說是自己家裏的——無論如何，雖然出現了不少關於民主的討論，中國當時仍然是一個封建國家。

朱德還記得他過去曾經玩過美國小孩會玩的那種拋接子遊戲，只不過他和兄弟們是用小石子和一個捲得很緊的紙團來充當彈子。秋天的時候，他和自己的哥哥們做了風箏，一邊從山坡上放飛，一邊嘴裏唱着用來辟邪的古老菊花歌：

菊花黃，吾輩強，
菊花香，吾輩康，
九九重陽，共飲菊酒。
人兒呀，菊花呀，
九九重陽，不醉不歸嚟。

這首歌就像交響樂中的主旋律一樣，時時浮現，並貫穿了他的一生。古時候，有這麼一個傳說：一位術士警告他的弟子們，只要他們和家人們逃到山上，就能躲過一場洪水。結果事後真的應驗了。從此以後，中國人就會在九九重陽這一天放飛風箏，高唱菊花歌。

朱德的大哥代歷比他大四歲。他有一支笛子和一把胡琴（就像是兩根弦的小提琴）。狗娃子經常蹲在他身邊，興致勃勃地聽他演奏。等自己的手長得夠大了，朱德也會演奏。長大成人後，他還買了很多樂器，並學會了演奏它們。

二哥代鳳年長他兩歲，這叫朱德很是苦惱。因為他經常捕鳥，待到年齡夠大了，就用家裏的鳥槍打鳥。狗娃子會跑到奄奄一息的鳥兒旁邊，把牠們捧在手裏，不住地為牠們哭泣。母親不允許代鳳殺鳥，

但他還是照殺不誤。

說起他的母親時，朱將軍的臉上寫滿了溫情與哀傷。他出生的時候，母親才二十歲出頭的樣子。她比大多數女人都高大健壯，褲子和外套上都打着補丁，很是破舊。她的手上佈滿凸起的青筋，還因為辛苦勞作，幾乎都變黑了。蓬亂的頭髮在脖頸處盤成了一個結。一雙褐色的大眼睛裏，透着善意與憂愁。

「我長得像我母親，」他說。「她總共生了十三個孩子。只有六個男孩和兩個女孩活了下來。最小的五個孩子一生下來就被按在水裏溺死了。因為我們家太窮了，養不起那麼多張嘴。」

家裏最大的孩子是個女孩，名叫秋香。她因為纏足而跛腳，一連哭了好幾個月。她十五歲的時候就嫁人了。秋香之後，母親生了代歷，是家裏的長子，小時候喚作「馬娃子」。然後是代鳳，小名「牛娃子」。朱德排行老四，是家中的第三個兒子，取名代珍。他們這一輩所有的男孩都是「代」字輩的，就像他們的父親和叔伯們都屬於「世」字輩一樣。

作為家裏的第四個孩子，同時也是第三個兒子，朱將軍說他「夾在一家子中間，不上不下。因此他既是受壓迫人民的兒子，同時在家中也是被壓迫的對象——不得不幫自己的兄長們跑腿幹活，還要做照顧弟妹們的保姆。我聽說，當我快要出生的時候，母親正在煮飯。飯還沒煮好，我就已經呱呱墜地了。生完我後，她又站起身，繼續做飯。我記憶裏從沒慶祝過甚麼生日——我們從沒為這樣的事情慶祝過。我家實在窮得可以，但我從來都不知道這件事，因為除了地主，其他所有人都是一個窮樣」。

他說他的母親「十分卑微，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還是小姑娘的時候，她還有自己的名字，但結婚後她為人所知的就只有家中的角色：她是孩子們的「母親」，是公婆的「二媳婦」，是丈夫口中的「你」或者「孩子他娘」。無論何時，她總是懷着身孕，總是在做飯、洗衣、做針線活、打掃衛生以及挑水。輪到她在田裏幹活時，她就像漢子一

樣賣力。農村姑娘之所以被選中做妻子，就因為她們能幹活，和愛情沒有任何關係。結婚前女人被她的父親管着，結婚後則順從她的丈夫和公婆。如果丈夫死了，就由她的長子管事，不能改嫁。這些是孔夫子定下的古老封建觀念。

婦女的職責就是幹活和生兒子，為家族添香火，給全家提供勞動力。她沒有任何個人權利。如果她沒法履行這些職責，她的丈夫可以和她離婚。她不能以任何理由和丈夫離婚，他卻可以因為很多理由把她「休了」——比如頂撞他或是不服從公婆的命令，對公婆不敬，或是話太多。想說多少就說多少，這可是男人的特權。

官宦和富裕家庭的男人們總是三妻四妾，但農民們可負擔不起。妻妾能提高男人的聲望——她們是舊封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朱家的婦女和姑娘，就像所有的農民婦女和姑娘一樣，被裹腳，被壓迫。讓女孩受教育被認為是愚蠢的行為，就像是給別人家的花園澆水。

朱德的大伯父朱世連是個非同一般的男人。他從不虐待自己的妻子，也沒有因為她無法生育而選擇「休妻」。由於沒有子嗣，狗娃子還小的時候就被過繼給他們做兒子。舉行過繼儀式後便正式收養了他。朱德不知道為甚麼選中自己，而且只要整個大家庭都生活在一個屋檐下，這種關係的變動並不會有任何影響。然而，在以後的幾年裏，這次過繼行為讓他成為朱家所有兒子裏唯一一個接受教育的人，為的是讓他保護家人，免受稅吏和其他官員的騷擾。

朱將軍的母親姓鍾。鍾家人本是四處漂流的賣藝人，在婚喪儀式和生日慶典上獻唱表演，或者在縣城集市搭起一個簡易的台子，表演一些滑稽短劇和古代傳統戲劇。這樣的戲子是社會的棄兒。他們窮得叮噹響，並且在政治上時常不受信任。

「不過，他們是一群非常開朗快樂的人，農民非常喜歡這樣的民間藝人。」朱德說。回憶起他們的時候，朱德的臉上露出了深情的微笑。

朱家的孩子們是唱着農歌長大的，每一件到手上的樂器，他們都會演奏——這可能是受了鍾家人的影響。有些民歌的調子很是憂鬱，

有的則十分歡快、喧鬧和滑稽。有幾首的歌詞是關於愛情的，其他的則是暗中諷刺時政。就有那麼一首曲子，批判了當時掌權的清政府：

想起四川的歷史，
天府之國啊，
是古代帝王們的首府，
國富而民殷，
八路先鋒震懾吳國。
大夫明堂前的柏樹，
古樹的樹幹啊，
昔日堅實的橫樑支撐着我們。
如今竟是這般景象！

朱家是成千上萬的「客家」人之一，也就是來自其他省份的移民，在本省扎根生活不足八代的家族。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他們才有被當做本省人的資格。第一批朱家人是從遙遠南部的廣東省遷居過來的。當時白蓮教起義之後不久，也就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這次起義，以及清朝的鎮壓，讓四川省的人口驟減。因此來自廣東和廣西的貧苦農戶陸續遷入四川，成了「客家」。儘管朱家在四川已經生活了約八十年，他們還是說着廣東方言，保留着廣東的習俗。一直到朱德這一代，成長的過程中才同時講廣東和四川兩種方言。

第一批朱家移民攢下了些積蓄，買了一小塊土地，在離儀隴縣馬鞍場不遠的大灣集鎮附近蓋了一間房子。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地主、官員和高利貸者接連不斷的盤剝，讓他們被迫將土地抵押並搬了出去，淪落為這個或那個地主的佃戶。朱德出生的時候，他家是為地主丁老爺家賣命的大約六十戶佃農之一。一提到丁老爺，他們都管他叫「閻王」。

朱家從「閻王」手上租來的三畝土地，要麼是梯田式的山地，要麼

就是谷地，幾乎每一寸土地都經過雙手的精心耕種。家裏的房子就在東邊森林覆蓋着的一座山腳下，旁邊則有一條湍急的小河。附近還住着另外三四戶佃農，他們和朱家一起組成了這個叫做琳琅寨的村莊。集鎮叫馬鞍鎮，在村莊北邊約兩英里處。再往前走一點兒，就是大灣，不遠處便是朱氏家族為之歎惋的老祖屋。再往北走二十五英里左右，是城牆圍起的儀隴縣城。對農民來說，這是一個了不得的「大都會」，只有少數人去過。朱家西邊幾英里處，嘉陵江穿流而過，是四川省因而得名的四條河流之一：四川的意思就是「四條河」。

朱家祖屋裏住着三代人：朱氏祖父和祖母；他們四個「世」字輩的兒子，以及兒子的妻兒們；還有就是朱德所在的第三代，都是「代」字輩的。

在第二代中，長子和大家族的族長是朱世連，也叫「朱老大」，是狗娃子的養父。狗娃子出生時，他大約三十七歲。二兒子朱世林，又叫「朱老二」。這個狗娃子懼怕的生父，是位性情暴戾激動的人。關於自己另外兩個小叔叔，朱將軍很少提及。而關於他的弟弟們，朱德也只是略微帶過。狗娃子的養父朱老大是個心思嚴密，雄心勃勃的人。他努力幹活，節衣縮食，每一分錢都摳着用，一大家子都由他操持着。

和所有的農民家庭一樣，朱家人構成了一個經濟單位——為了避免捱餓，他們組織起來進行艱苦、有紀律的勞動。

「我的祖母組織和指導整個家庭的經濟，」朱將軍解釋道。「她給每一個成員分配任務，繁重的田間工作交給男人們去幹，較輕鬆的田間工作和家務活交給女人和孩子。她的四個兒媳，依次一年一個，輪流給全家人做飯，並由年輕的孩子們打下手。其他女人則負責紡紗、縫補、洗衣、打掃衛生、或去地裏幹活。每天清晨，那年負責做飯的媳婦就得起床、生火，開始準備早餐。一聽到祖父走動的聲音，我們其他人都通通起床，立即去做自己的家務，比如從井裏挑水、砍柴、給鴨子、豬和雞餵食、或者打掃衛生。

「一年到頭，所有的飯菜都是一個樣。男人們都在一起吃飯，因

為這是習俗。他們吃完了才輪到婦女和兒童。我們太窮了，除了極少數情況下，根本吃不起米飯。早餐是高粱稀粥，也許會摻一點米或豆子，還有一碗普普通通的蔬菜。我們也喝茶，當然不會加糖。午飯和晚飯吃的東西大致相同。不過吃的不是稀粥，而是混了米的高粱乾飯，還有一碗或兩碗煮過的蔬菜。要是我和兄弟們抓了魚還沒被逮到的話——我們喜歡抓魚——我們也許可以吃上一碗米飯。肉或其他特別的食物，就算有，也只有在慶祝農曆新年的時候才會擺上桌。

「雖然四川是個產鹽大省，但鹽的價格卻非常昂貴，窮人會儘可能少買。當時有三種鹽：富人用精製的白粒鹽，中等條件的人用棕色鹽，還有一種黑乎乎的不夠純淨的鹽，被做成硬邦邦的鹽巴，賣給我們這樣的窮人。這鹽巴非常珍貴，不會和食物放在一起烹調。它要麼被放進熱水裏溶解，裝一碗這樣的鹽水放在桌子中央，供我們蘸蔬菜吃。或者用碗裝一大塊鹽，擺在桌子中間。我們就夾着濕蔬菜，在上面刮一刮作為調味。

「我的祖母不僅僅分配大家幹活，還根據年齡、需要和工作完成的情況來分配食物。即使在吃飯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甚麼叫個人自由。我們總是還餓着肚子，就不得不離開桌子。我是在飢餓中長大的，所以後來搞革命的時候，飢餓並沒有讓我感到多麼困擾，就像我從來都不知道飢餓一樣。幹活方面也是如此。我從小到大都在勞動，所以後來我在做體力勞動時，從來不覺得丟面子。走路也是一樣：成年之後，我有時會騎馬。但我一生當中大部分時間都在走路，長距離的行走，常常一走就是幾個月或幾年，和我指揮的戰士們一起，肩並肩地走着。

「等我們的革命取得勝利後，我們會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將豐衣足食。他們會有火車和汽車可坐，有時間和精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養——儘管在最困難的情況下，我們也在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我的祖母是個異常能幹的女人，也是一個很好的管理者。和我家裏的所有成員一樣，直到去世前，她一直盡自己全力在做事。她確

保每年都向地主支付足額的租金，這就相當於一半以上的糧食作物。另外還有些必須奉行的封建禮數，比如贈送額外的禮物——雞蛋，時不時要送一隻雞，有時甚至會送一整頭豬。我們都痛恨這些古老的封建禮數——我說它們是封建的，雖然這個詞有着許多不同的含義。因為地主階級將各種奴役性質的義務和責任強加在了我們和其他佃農身上。

「舉例來說：每年夏天，地主要把他的一大家子都搬到他們山上的避暑莊子裏的時候，所有佃戶家的男丁們都必須放下手裏的全部農活，義務搬送他的家眷。到了秋天，又必須把他們接回來。此外，遇到社會動亂的時候，比如匪盜橫行或農民起義，他的佃戶就必須集結在地主家裏，拿着分發下來的武器，為保護他們的地主和主人而戰鬥。農民們帶着宿命般的絕望接受了這些古老的封建習俗。他們看不到任何出路。」

和其他家庭一樣，朱家要在農曆新年初一的黎明前結清所有年租。每年除夕，朱家人會在堂屋集合，而祖母則會在長子——朱德的養父——的協助下，把一年收入的相應配額分給每一個人，還會決定每個人需要甚麼樣的衣裳。女人們對家裏的每一塊衣料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知道誰的褲子可以再打打補丁，誰又應該做一條新褲子了。每一件衣服都被反覆穿用，補丁打了又打，直到最後爛得一塌糊塗。每件外套和褲子都要精心呵護，而由女人們親手製作的布鞋只有在很少的場合下才穿，因此可以維持很長一段時間。等到家庭會議把一切事項都安排妥當，節儉的老祖母就會把家裏剩下的積蓄都收起來，埋在她臥室地板下的一個罐子裏。

早餐結束後就得立刻開始幹活了。而且除了午飯和晚飯的時候，得一直幹到天黑大家都去睡覺為止。天黑之後如果點燈，會被指責是奢侈的行為，就像家裏的男人抽他們在田裏種植曬乾後準備去市場上售賣的煙草一樣，也會被視作浪費。時不時地，朱家的男人們會裝上一煙袋，輪流傳下去，每個人抽上一口。朱德的父親有時候會當着大

家面說，每個男人都應該有權享用一整袋煙。但他是個性格易怒，行為暴躁的傢伙，其他人必須好好對他加以管束。

朱家眼裏容不得懶惰和懈怠，也沒有每週該有的休息日。對其他農民來說也是如此。家庭條件好的人們可以在慶祝農曆新年的時候好好享受一兩個星期。但對於佃戶和貧農來說，即使是這段時間也沒法休息。農民在冬天的那幾個月裏可以稍微放鬆一點兒，但即使如此，必須翻整一下土壤，為春耕做準備，或者把冬季作物種下去。夏天養的豬和雞被帶去集鎮上換成鹽巴。等把地裏的棉花摘下和清洗後，婦女們會將它們紡成紗線，但不會直接織成布。織布的活兒會交給走村穿縣的織匠完成。這些織匠都是男人。在冬天，還得拿地裏種的油菜籽榨油。榨好的油要麼用來做飯，要麼用來售賣，或者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會被放在碗中，裏面插一根棉花捻成的燈芯，用於晚上的照明。朱德到了二十歲的時候才在夜晚點上了燈。那是做了學生之後回鄉的時候，他才有了自己一個人睡的床，有了一個人的屋子。而這也不過是短短幾天而已。

還有一條古老的、不成文的封建規矩。在新年或其他國定節日，或是特殊場合，比如地主的老婆或是某個妾室生了兒子，又或者為某個來訪的官員籌備宴會時，所有佃戶，無論男女，都必須無償地為他們的地主賣命幹活。在這樣的特殊場合，佃戶們也要向地主贈送食物當做特別賀禮。

「地主根本不在乎農民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糧食，也不在乎他們自己家裏是不是需要耕種或收割，」朱將軍恨恨地說。「非但我家的男人們不得不去，我的母親和養母也不得不去閻王家的廚房幹活。她們回家的時候，有時會拿出來一些悄悄藏在衣服裏的美味食物，給我們這些孩子每人吃上一口；然後給我們講聽起來像是童話一般的故事。」

有時候，當朱將軍這樣說話時，我會沒法堅持記錄下去。而他則會用好奇和充滿疑問的眼神看着我。

我會解釋說，「有時候，你好像是在描述我的母親。我們沒有為封建地主幹活，但我的母親也為有錢人洗衣服，節假日在他們的廚房裏幫工。她有時候會給我們這些孩子偷偷帶些食物出來，給我們每人咬一口，告訴我們她雇主家裏的那些美食佳餚。她的雙手也因為勞動而幾乎變黑了，她在後頸把頭髮盤成一個結。她的頭髮是黑色的，而且很是蓬亂。」

「你的父親呢？」他不可思議地問道。

「在我幼年的時候，他是一個貧苦的農民，會光着腳板犁地，但大部分時間裏，他還是會穿皮鞋。他討厭我們的生活，所以時不時就會離家出走，把我母親一個人拋下。他不像你們家的男人們一樣守規矩。後來他成了一個沒甚麼技能的散工，我們也從來都沒吃飽過。不過，我們倒是不缺鹽。」

「世界上的窮人都是一家人，」他用沙啞的聲音說道。我們就在那裏，默默坐了良久。

第二章

朱將軍每每提到四川時，從來都沒有忘記它壯麗的景色。他家周圍聳立的群山，是沿川西邊界延伸的大雪山的一條向東凸出的餘脈。大雪山及其北部凸起的支脈遮蔽了整個四川省和被稱為「紅色盆地」的廣闊封閉平原，讓全省的氣候溫暖而清爽，溫帶和亞熱帶的豐富植被在這裏得以蓬勃生長。省城成都就在紅色盆地的中心地帶。這個盆地乃是中國最富饒的地區之一，全年都有農收。該省還盛產鹽和各種礦產。朱將軍提醒我說，「法國和英國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一直對四川垂涎三尺，密謀將其納入自己帝國的版圖。」

「你見過四川的花卉嗎？」他突然問道。「它們又大又漂亮，而且還香得很，周圍幾里的空氣裏都能聞到花香。」

他的家是一座黑漆漆的老建築，歷經數十年風雨而搖搖欲墜，就建在這壯麗的自然美景之中。屋子狹長的東西向房間朝南，覆蓋着灰色的屋瓦，粗糙的門上沒有塗漆，就掛在木質門軸上，像中國內陸的大多數木門一樣，可以卸下來當床睡。房子兩邊較短的側廂房鋪的是稻草屋頂，和主屋相對成一個直角。那裏沒有窗戶，唯有房門可以採光。地面是壓過的土坯，光滑而堅硬。房子用泥漿粉刷，沒有塗漆。天氣暖和的時候，一家人會在半敞開的院子裏吃飯。到了收穫季節，

這裏也被用來當作打穀脫粒的場地。

除了廚房——就在你進門的左手邊——和上房中央的堂屋，剩下的房間都是臥室。還有一座倚牆搭建的披棚，用來養豬和養雞。上房的堂屋是一家人聚會的場所，也是接待訪客或舉行大禮的地方。房間正中央有一張粗糙的方桌，周圍擺了幾張凳子。桌子正後方靠牆放着一個龕櫃，裏面供奉着祖先們的牌位——牌位由光滑的小木板製成，每一塊牌位上都寫着一位祖先的名字。而在龕櫃前的一個架子上，則立着一尊小巧的泥塑觀音菩薩像。

朱家人每年都會在這個供奉祖先的龕櫃前上供幾次，包括農曆新年以及七月十五祭奠逝者的中元節。當農曆新年臨近時，他們會從廚房爐灶後面的牆上取下那幅髒兮兮的灶王爺畫像，用野蜂蜜塗抹灶王爺的嘴唇，好讓他為了一家子向天庭美言幾句，然後在院子裏把畫像燒了送灶。新年初一那天，家裏人會用漿糊把一幅新畫的灶王爺像貼到牆上。

朱家人很相信這種古老的儀式。他們相信有照拂莊稼收成的土地神，也相信世上有許許多多善惡不一的神靈。無處不在的狐狸精特別招人討厭，不但會胡鬧搗蛋，甚至會偽裝成很多樣子，比如長着鬍子的老人，或是偽裝成美麗的年輕女子，以此來魅惑隱士或寂寞的讀書人。「當然，這純粹是迷信，」朱將軍微笑着說，「而且對寂寞的讀書人來說，未免想得太美了。」

他的家人相信，他們的貧困和艱苦生活都是因為命不好，是災星造成的。他們目不識丁，並且消極悲觀地為自己不幸的命運歎息。除了努力勞作之外，他們甚麼都不懂。在童年時期，狗娃子對一切流行的迷信說法，包括鬼神之說，都篤信不疑。有一回，他在大道上聽一個旅人說起一位在美國唸書的人。似乎那裏的人通常不信鬼神，因此那兒沒有鬼魂存在。這話給朱將軍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於五十年後他還記得這句話。

「大道」——在朱德心中，也就是那條經過他家門口的那條單向

道——是對他童年最重要的影響之一。它是古代驛道的一條支路，而驛道構成了一個橫跨帝國版圖的鬆散網絡。這條大道自南邊而來，向北延伸至儀隴縣，然後穿過山區，並在那裏和通往西安和東北方向的北京的一條主要驛道會合。

他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觀察「大道」上往來的旅人。有從南面的重慶一路遠來運輸貨物的商人，有漂泊江湖的藝人，偶爾有穿着長衫的讀書人，有時候甚至連「丁閩王」本人也會打這兒經過。他坐在精緻的轎子上，手拿摺扇替自己扇風，而僕人則在他身旁奔跑着。農曆新年將近時，官員們有時會坐着精緻的綠色轎子，家僕和隨從們在身旁一路小跑，或者先行一步開路，驅離閒雜人等。送葬的隊伍經過這條路時，棺材後頭跟着身穿粗布白衣，戴着白頭巾的送葬者，其中有些人顯然一副樂在其中的樣子。經過的還有迎親的隊伍。一身紅衣的新娘羞答答地躲在大紅花轎的簾布後頭。整個隊伍向前行進，後邊跟着打着橫幅和敲着鈸的男人們。另一些人則抬着轎子，上面裝着她的傢具和衣服，以及她作為嫁妝帶到丈夫家的所有東西。這些婚禮通常是歡樂中摻雜着下流的活動，世界各地農民的習俗大抵都是如此。有經驗的已婚婦女會給新娘子各種建議，而內容會讓新娘羞得面紅耳赤。男孩和男人們還會在新娘床榻下邊充當彈簧的棕繡上繫上鈴鐺。

狗娃子會經常蹲在眠犬山上，看着形形色色的世人在眼前經過：養在深閨的貴族小姐坐着轎子途經此處；農婦騎着驢子晃悠悠地經過，要去某個寺廟上香求子，向算命先生求籤問卦，或者是每年一次回娘家省親。到了趕集的日子，像狗娃子母親家那樣的劇團可能經過這裏。還有挑着農產品準備售賣的農民。一排排從事運輸的苦力們會經過，肩上掛着裝有鹽巴的狹長籃子。這些運鹽的苦力都是衣衫襤褸的苦命人，他們的身體瘦削憔悴，腳和腿上有時佈滿了流膿的瘡口，許多人還因為得了結核病而咳嗽。

有時，朱家的男人們會離開田地，與一些路過的旅人交談。這些

人會停在屋前的樹蔭下歇腳並喝點兒熱水。狗娃子從這些人口中了解到，中國比「天府之國」四川大得多了。他聽他們侃侃而談，提到重慶、西安以及「老佛爺」端坐龍椅的北京城。他們有時候甚至會提到朱德祖先們居住的故鄉廣東。作為四川的省城，成都據說自古以來就有着又高又大的城牆，總共有五道城門：清遠門朝向大雪山、西藏和中亞地區；迎暉門朝東而立；而離朱家最近的城門就叫「老北門」而已，倒顯得不太公平。

大清帝國各個地區的商人們長途跋涉來到成都，購買皮革、麝香、玉石、茶葉以及四川極負盛名的特色藥材和高級絲綢。他們還可以買到虎骨和鹿角，用來治療某些疾病。此外還有人蔘，要知道這種珍貴無比的草藥可是按分量以銀子計價的。

時光如流，狗娃子又聽說了更加遙遠的城市和地方：比如雲南府^①，遠在西南，乃是雲南的首府，字面意思是「彩雲之南的土地」。還有雲南地界之外的緬甸，在狗娃子出生的前一年，被英國蠻子從中國手中奪走了。同樣是在那一年，法國和中國交戰，奪取了廣東南邊的安南。北京為了負擔那場戰爭而提高了鹽價，結果導致了民眾的暴動。

這孩子還從「大道」上經過的旅人那裏，聽說洋鬼子總是在戰鬥中打敗中國軍隊；聽說清朝的腐朽無知和暴虐無度，軍隊則是一無是處；還聽說年復一年，人民長期積壓的憤怒在不斷高漲。世道變得愈發艱難，城裏的物價在短短幾年內就翻了一番。

「我曾經跟着『大道』上的旅人們一直走着，直到他們命令我回家去，」朱將軍說，「我當時想要出去看看。」

四季變換，漂泊的工匠們會離開大城鎮，沿着「大道」而來，從一個村子轉到另一個村子，為需要他們特殊手藝的家庭幫工。木工、鐵

① 1381年，即明太祖洪武十四年，改元中慶路為雲南府。清末時管轄昆明、富民、宜良、呈貢、羅次、祿豐、易門共七個縣，以及高明、晉寧、安寧、昆陽共四散州。民國二年（1913年）遭廢除。

匠、織蓆匠、織布匠和其他手藝人，都是攜帶着自己專業工具的熟練工匠。每年秋天，織蓆匠們會來到朱家修整舊蓆，或者根據主人家的需要來織出新蓆。這些蓆子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是用來抵禦冬季嚴寒的床墊。它們有雙人床那麼大，編織得很緊致，有兩英寸、四英寸、或者更厚，而且織好的蓆子還有漂亮的花樣。剛織好的蓆子會有一股香味，並呈現出金黃的色澤。

有一位老織匠（朱將軍就是這麼叫他的），每年冬天都來家裏，用朱家婦女們紡好的棉線來織布。織好的粗布然後被染成靛藍色，掛在長長的竹竿上晾乾，之後由婦女們將其剪裁縫製成家人們穿的衣服、被套、或者其他家庭所需。

「這些漂泊的匠人們是農民經濟的一部分，」朱將軍解釋道。「他們來自大城鎮，相比農民，他們更加進步和獨立，能給農民帶來新思想。他們甚至算得上是民間歷史學家，其中一些人能讀會寫。他們住在自己幫工的那戶人家裏，每天晚上全家人都聚在一起聽他們神侃。匠人告訴我們，清朝政府把我們出賣給了想要奴役我們的洋鬼子；我們和其他農民繳納的不計其數的稅款都被交給了洋人，要麼用來支付貸款，要麼用來清償戰爭失敗後強加給中國的賠款，而這些戰爭都是洋鬼子先發動的。他們說，我們之所以貧窮，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命不好，而是因為土紳貴族們過着奢侈無度的生活，然後把所有的稅賦都壓在了人民身上。我那時也不太清楚，所謂奢侈無度的生活是甚麼意思，大概是指人們可以想吃甚麼就吃甚麼，能穿上漂亮的衣服，住在上好的房子裏，不管甚麼事情，都可以派奴僕去幹——就和我們的地主一樣。」

四處漂泊的工匠們對中國歷史非常了解。他們有時會提到本世紀早些時候爆發的鴉片戰爭和其他與列強的戰爭摧毀了中國的主權，並將當時數額驚人的賠款強加給了我們。清廷「害怕得要命，哆哆嗦嗦地順從了洋鬼子的一切要求」。現如今，機器生產的洋貨幾乎不用交稅便能輸入中國，它們正在摧毀中國的商品以及工匠們的生計。他們

還說，在四川的外國傳教士傲慢無禮。傳教士和他們的信徒瞧不起中國人，就因為中國人不相信外國的神靈，便用「粗野的異教徒」這樣的字眼來稱呼我們。

朱家人都知道，就在狗娃子出生的那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四川中部引起了一場暴動。法國天主教神父為他們的中國教徒申索治外法權。假如教徒在與並非教徒的中國人發生糾紛並被送到地方官面前，法國神父就會威脅官員，直到他做出有利於教徒的裁決。四川有一個地主被這種偏袒行為激怒了。他於是組織了一支農民隊伍，燒了天主教堂，攻擊那些皈依的教徒。當政府對他實施逮捕和囚禁，並用酷刑將他殺害了以後，他的兒子又接替他繼續戰鬥，直到這個兒子也遭到逮捕和殺害。這場暴動也就這樣被血腥地鎮壓了。

說起每年來到他家的流動工匠們，朱將軍是這樣評價的：「他們是後來的工業無產階級的先驅者，因此相比農民，他們得到了更徹底的啟蒙、表現更加獨立、思維更加機敏。」

有些工匠講述了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運動的故事。這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中國農民起義，像極了三個世紀前的德國農民戰爭，甚至兩者都具有基督教色彩這一點上也呈現出驚人的相似。事實上，那個每年冬天來朱家的老織匠，過去就曾是太平軍石達開麾下的一名兵卒。石達開是太平天國最受愛戴的將領之一。他是客家人，還是一名學者。他賣掉了自己所有的家產（包括他的土地），並把所有的錢財交給了太平軍。太平軍中有很多客家人，因為這支軍隊是從南方起事，而客家人就聚居在華南沿海地帶和華南南部地區。沒人確切地知道客家人的原籍是甚麼地方，但據說他們可能是幾千年前來自中國北方的移民的後代。他們至今仍然保有自己獨特的方言和習俗，客家婦女也從來不裹小腳。朱德將軍的參謀長葉劍英將軍本人也是客家人，他部隊裏的很多士兵以及他的一些指揮官也是如此。

每年冬天為朱家織布的那個老織匠似乎也是客家人。這個老頭平日裏表情嚴肅，言辭犀利。他會在院子裏架起狹長的織布機。如果天

氣太冷，他就在廚房裏開始織布。狗娃子着了迷似地在一旁盯着看，因為老人那雙褐色大手在幹活時動作飛快。他每天可以織二十尺，換算過來大約是二十到三十英尺的布。他每尺收取兩三塊現金，並且按照慣例，要求包吃包住。這對一個人來說是筆很可觀的收入；幹一天就夠他生活一個禮拜。

儘管老織匠嘴上不饒人，但聽他講話，朱家人從不會感到厭煩。狗娃子經常蹲在他身邊，請求說：

「親愛的織匠爺爺，求求您給我說段故事吧。」

於是乎，這位有着褐色大手，滿臉皺紋的嚴肅老人便打開了話匣子：

清廷的這些人知道如何壓榨百姓，但我們給了他們一點教訓：別再把百姓當做隨意拿捏的豆子，不要每次想為自己建造新的宮殿，就覺得可以從豆子裏榨出油水來。和我在紅色旗幟^①下作戰時相比，現在所有人都更窮苦了。現如今，只要花兩萬兩銀子，任何人都可以當縣長，管自己叫百姓的衣食父母。儀隴縣每年必須送五萬兩銀子去成都，而縣長卻要從老百姓那裏榨取十倍於此的銀子。我年輕的時候，無數男男女女追隨忠王李秀成。他率領太平軍，決不向清廷、混賬士紳以及洋鬼子低頭屈服。我是石達開麾下的士兵。他雖然很有學問，還被封了王，但卻決不允許別人向他磕頭。可如今人們不但依然在磕頭，而且自以為辮子越長越好，簡直生來一副賤骨！

石達開率領我們的部隊橫掃整個南方並向西邊挺進時，清兵們在我們的進攻之下，就像是穀糠殼，一擊即散。到了貴州桐梓，我們剛剛從南門入城，清軍就從北門逃竄出去。百姓們

① 「紅色旗幟」指的應是太平天國軍所使用的紅色令旗。

歡迎我們，恭稱石達開為「翼王」。石將軍讓百姓們到鼓樓集合，告訴他們說，我們要把土地分給那些在地裏幹活的人。這些土地不再屬於那些如老虎般兇惡的士紳了。

百姓們準備了盛大的宴會，懇請我們留下來。他們把銀兩交給石將軍，但他卻告訴他們把銀子分給將士們。百姓們照做了，儘管我們並不是為了錢而戰鬥的。

我們沒法在桐梓長留，因為我們計劃把清軍從四川以及全中國的土地上趕出去。石達開對此解釋過很多回，但當我們準備上路時，百姓們還是緊緊地抓着他的馬鞍哭泣。我們於是掉轉頭，又多待了一個晚上，並且又舉行了一場宴會。翼王同意留下一百名兵卒，訓練年輕人如何作戰。我們離開桐梓的時候，百姓們仍然淚流不止，跟着我們走了好長一段路。每到一處，這種情況都會發生。敵人們說我們是強盜和土匪，而百姓們卻管我們叫「救世主」。

有這麼一個小鎮，那裏有個和丁閻王一樣富有的地主。他帶了一箱銀子和一個丫鬟，前來送給石達開。但翼王站起身來，大發雷霆地呵斥道：

「你把我當成狗官了嗎？我命令你把土地分給你的佃農們，把你的僕從丫鬟全部放走，把你所有的銀子都分給他們。限你太陽下山前把這件差事辦妥了。」

這個地主跑到河邊，跳下去自盡了。他的死活嘛，沒人在意！

沒錯，我們的軍隊兵敗大渡河。當時我不在那裏，而是跟着另一路部隊穿過四川，打算從東面包圍成都。與此同時，石達開則帶領四萬人從西邊發起進攻。翼王的部隊在大渡河邊就折了幾千人。還有一些死在了河裏，因為他們餓極了，寧願死在河裏也不願向清軍投降。他們沒有餘糧，把自己的馬和騾子都吃了。翼王的先頭部隊就在大渡河邊折戟沉沙了。

指揮清朝軍隊的是成都總督駱秉章，由劉蓉^①作為副手從旁協助。這兩個魔鬼收買了一些彝族人，給他們提供洋槍，從後方攻擊石達開的部隊，切斷了他的糧食補給。駱秉章的軍隊由強盜和小偷組成，還從洋鬼子那裏得到了步槍和大炮。他們沿着大渡河邊建起了防禦工事，石達開便沒辦法渡河，因為我們太平軍的武器唯有弓箭而已。

敵人在河的北岸豎起旗幟，上面寫道：「歸降者，可活命。」石達開是個有文化的人，他唸着這句招降的話，並對他的士兵們說：「若戰，則死。不戰，亦死。吾輩當死戰！」

他們造了木筏。上了筏子的五千人，在身前舉着皮盾，手裏握着長矛。他們的兵長們穿着紅衫，無所畏懼地站起身來。士兵們則奮力划船，個個都勇猛地呼號着，自始至終面朝着對岸的敵人。然而，外國的大炮隆隆作響，木筏全部被炸毀，不可盡數的屍體，將大渡河都堵塞了。

石將軍的心中滿是苦澀。他獨自走到一片亂石崗，跪在那裏向他和我們許多人當時信仰的上帝祈禱。但上帝沒有顯靈，而石達開則流下了眼淚。當他站起身的時候，一位貧苦的農民正在用鋤頭挖地。石將軍走上前去問：

「老鄉，我是石達開。清廷懸賞了重金要我的腦袋。拿着我的劍，砍下我的頭，你就不會再貧窮了。」

這個窮人跪了下來，說他不能這麼幹，然而石達開把他扶了起來，告訴他不要向任何人磕頭。

現如今，有的說書人會告訴你說那個窮人拿劍砍下了石達開的頭顱並交給了清軍。那是謊言。翼王沒有被殺，也沒有像駱秉章鼓吹的那樣，在成都被凌遲處死。

實際上，石達開從亂石崗回到了自己的營地，他的四姑娘

① 劉蓉（1816—1873），湖南湘鄉人，清朝湘軍將領，曾受駱秉章保薦出任陝西巡撫。

在那裏站起身來迎接他。這個四姑娘並不是他的親生女兒。她一家子書香門第，全部遭到清軍的殺害，是石將軍救了她。她的家人把她當兒子一樣教育，因此頗有些學問。石達開把她救下的時候，她為了報恩，曾自願嫁給他做妾室。但石將軍收她做了義女，她就替他謄抄公文和信件。

有一回，這位四姑娘遇見了一位太平天國的將領，長得和石將軍十分相像。於是她請求她的養父把她嫁給這位將領做妻子。石將軍就這樣照辦了。

話說回來，翼王石達開在上帝沒有回應他的那天回到營地，四姑娘說她擔心全軍很快就要餓死了，因為再也沒有馬或者騾子可以殺來吃了。已經有五千人溺死在了大渡河，而其他人都跳了河，死也不願投降。

四姑娘向石將軍苦苦哀求，說河對岸的招降旗幟上寫得明明白白，太平軍所有人等，只要投降便可活命。她懇求翼王逃命去，以後再帶着我們的軍隊逐鹿天下。同時讓她長得很像石將軍的丈夫全去投降。

於是就照這個辦法做了。向清軍投降的四姑娘的丈夫在成都被凌遲處死，而下令的總督駱秉章以為他就是石達開。

石將軍剃了頭，像和尚一樣在頭頂燙了戒疤，穿上紅花袈裟，扮做出家人走了。他自始至終都沒有和我們在四川中部的那路部隊匯合，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的精銳也已經折損殆盡，整個部隊也散了。我就重新幹起了織布的老本行。一年之後，我們的京城南京被清軍和洋鬼子攻陷了，而我們的總指揮忠王李秀成也落到了曾國藩的手裏，並在午夜被他殺害了。忠王信義卓著，視死如歸。他是國士無雙的大英雄。清軍和洋鬼子攻下南京後，屠城三天三夜。但沒有一個太平軍向他們投降。

老織匠歎了口氣，陷入了沉默。

「石達開後來怎麼樣了？」儘管所有人已經聽過上千遍，早就爛熟於心了，但還是有人忍不住問道。於是老織匠接着說：

御用文人吹捧清廷的走狗曾國藩，說他是個了不起的將軍和學者，說他擊潰了我們。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擊敗我們的是清兵和士紳手裏的洋槍。曾國藩害怕洋人，但他更怕中國人民。他麾下的軍隊是由清兵、漢族士紳以及洋鬼子組成的，他們在攻陷的城市和村子裏屠殺百姓。我們太平軍善待降者，把我們的食物分給飢民，給有需要的百姓們提供無息借款，而我們的敵人可從來都是見死不救的。總督駱秉章在大渡河打出旗號，許諾所有太平軍「投誠免死」。石達開的軍隊投降了，士兵們被繳去了武器，然後全部帶到大樹堡殺頭。清兵們啊，根本不知道信義為何物。

每逢難見月光的黑夜，你仍然可以在大渡河渡口和他們被屠殺的城鎮上空，聽到死去的太平軍將士的哀鳴。除非大仇得報，哀鳴才會停止，他們的靈魂才能得到安息。

老織匠看着他的聽眾們緊張出神的臉孔。周圍已經聚集了好多聽眾，於是他繼續說道：

在那之後，很多人都見過石達開。有兩個人不久之前還在嘉定的岷江渡口看到過他。其中一個是船夫，另一位是來自浙江的李姓商人，他當時從重慶來成都採買麝香和草藥。那船夫正準備發船時，來了一位留着長長的白鬍子、打着紙傘的長者，要求免費捎他過河。船夫說錢無所謂，於是老者說：

「假如你此刻渡河，風暴會把你的船打沉的。」

船夫大吃一驚，因為之前天空中連一朵烏雲都沒有。他抬頭看了看天，驚訝地發現烏雲正在群山上方翻騰。他繫好船，